

※ 韓南教授紀念專輯 ※

韓南教授追思紀念文

魏愛蓮* 著 王 翎** 譯

那天我接受《哈佛學生報》(*Harvard Crimson*)的記者訪問，對方請我描述認識韓南教授以來，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一次互動。當時我唯一能想到的，就是一九七三年去上韓南教授開的傳統戲劇及小說課，我是班上唯一的學生。雖然過了這麼多年，我還是一直牢記著，老師會站在講臺後面，照著他的筆記，很正式地為我這個唯一的聽眾授課。不只這樣，他還會從對面細看我寫了什麼，如果覺得倒著看不夠，或是他想要確認我寫的中文字都沒錯，他會走過來在我身後站一會兒。等到都沒問題，他覺得滿意了，才回到講臺上。

課堂上的互動已經令我印象相當深刻，但是當我回去看保存至今的中文 121b 課的筆記，我發現原來老師授課的內容才真正令我難以忘懷。那時候我們公認的「紫皮書」剛剛出版，它真正的書名是《中國的短篇小說：年代、作者、作品研究》(*The Chinese Short Story: Studies in Dating, Authorship, and Composition*)，這本書的開頭引用了山謬·泰勒·柯律治(Samuel Taylor Coleridge)於一八〇〇年二月三日寫下的一句話：「任何聲稱為真實的作品必定會有證人，而且是適格的證人；即外部證據。或者作品可以是它自己的適格證人；即內部證據。」重讀課堂筆記，再回想老師在那個時期的著作，讓我憶及當初是什麼吸引我進入這個領域。

我剛進哈佛的時候，想說可能會做中國古代史，覺得在新出土的證物裏發掘中國過去的樣貌的構想很吸引人。但是韓南教授溫文和藹，而且我在老師的引導之下，在他構思的研究領域裏有了新發現，自然就請老師當我的指導教授了。

從新發現的角度來看，中文 121b 課還有我自己專攻的研究領域裏最有趣的部

* 魏愛蓮 (Ellen Widmer)，美國衛斯理學院東亞系教授。

** 王 翎，專業譯者。

分，是白話短篇和長篇小說。我從老師身上學到很多：文言和白話短篇小說之間有哪些差異；如何依據白話短篇小說中呈現的對於社會階級的同情態度，來分辨不同的目標讀者；如何將白話小說如《水滸傳》和早期的白話短篇小說並列對照，來判斷它們的成書年代必然約略相當。當時韓南試圖根據作品的「內部」證據來判別成書年代，他也提醒我們務必謹慎：我們可能永遠無法找出《金瓶梅》的作者，《西遊記》的作者很可能是吳承恩，但我們無法完全肯定。

一九七〇年代早期是充滿機會的時代，因為多年來都是禁區的中國圖書館終於開放，中西學界攜手合作的契機剛剛開始浮現。白話小說研究的地位也向上提升，老師相信當時是投入這個領域的大好時機。

師從韓南教授給我最深刻的影響，就是老師對圖書館的熱愛，和他對於圖書館在未來幾年為新研究提供養分所寄予的厚望。因為一九七〇和八〇年代根本沒有網路可言，他做研究都要依靠在中國學術界的人脈和圖書館目錄，不論哪種管道都要透過神祕的方法才能取得資料。他毫不藏私地將這些悉心教給我和其他學生，這樣我們才能充分善用這些待開發的寶藏。他還傳授了其他的重要工具，也就是研究方法：何謂內部和外部證據、如何謹慎運用兩者，一廂情願和客觀證明之間的差異，以及如何將文本理解為經過不同階段演變出來的結果。

我憶起這些過往點滴，不只是因為《哈佛學生報》記者的問題，也因為我讀了韓南教授的老友白芝 (Cyril Birch) 教授寄送給哈佛燕京學社的追思文。白芝教授講到一九八〇年一月在北京極寒冷的一天，他和韓南教授在參訪之餘有些閒暇時間，白芝教授前去訪友，而韓南教授決定在圖書館度過。白芝教授在文中如此描述：「我終於有機會親眼見識何謂凍得發青。韓南把自由活動的時間全耗在冷僻昏暗的圖書館裏，只穿著普通西裝的他，就在沒有暖氣又像迷宮般的書庫深處埋首整日。他渾身抖個不停，甚至需要花點時間等身體退冰回暖之後，才想到要吃晚餐。不過他很開心——他有了新發現，多美好的一天。」

一九八〇年一月，那時我即將完成博士論文。我記得很清楚，從北京回來的韓南教授意氣風發，因為他在當時的北平圖書館的善本書庫裏發現「我的」(“my”) 作者寫的詩作。老師一如往常地謙遜，對於寒冷的天氣隻字不提。那時候我的論文算是完成了，所以沒辦法再加入新發現的資料，但是老師大力幫忙，讓我兩年後能夠前往北京。因為老師發現了這些可供作為「外部證據」的詩作，我以博士論文為基礎改寫的專書內容也就大為豐富了。韓南教授深信明清小說研究的潛力無窮，一定

會有更多新發現，發掘「我的」作者的詩作就是最好的證據。對於像我這樣的後生晚輩，老師總是多所照拂，滿懷熱情地引導我們躋身獨當一面的學者行列，他在北京那一天的閒暇時間在圖書館裏的新發現，就是他提攜後輩不遺餘力的最好證明。

